

环卫工人资助“摊派”贫困生8年

8年前,当环卫职工的陈学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,因领导半开玩笑的“摊派”,结对资助了初一贫困生苏丽。

8年来,这个“摊派”的资助不断“升级”,从初中到高中,再到大学,因为他们已经成了亲人。



苏丽(左二)与干爹陈学强一家照的全家福



为了苏丽,周恩碧在食堂打工

“女儿”面临去留矛盾

重庆邮电大学通讯工程专业大三学生苏丽,下个月将到外省实习。是留在重庆就业,还是到外省寻求发展?19日,在学校帮忙的她再次给干姐陈佳打电话讨主意。

陈佳是陈学强的独生女,不过,从苏丽跨进自家,称父母为干爹、干妈起,她就习惯了“姐姐”这个角色。“8年多来,妹妹在学习、交友、生活上遇到困惑和难题,都会和我讨论,我也总是尽力给她出主意。”

老陈一家希望苏丽能留在重庆,“这样可以经常看到和照顾她,如果她想外出锻炼、增长见识,我们一致支持。”

但54岁的周恩碧忍不住道出自己的担心:“就怕走远了,万一遇到事,找不到人商量,再说她也没有社会经验……”

事实上,妻子对小丽的不舍,也是老陈的心声。表面上,他还是安慰妻子:“雏鹰长大了,就应该让它独立去飞;孩子成人了,我们也应该让她去施展自己的抱负!”老陈告诉小

丽,无论将来距离远近,不管有怎样的人生,“只要你愿意,这里永远是你的家,我们永远是你的亲人。”

他们之间,为什么有如此深厚的感情?

贫困户“摊”上贫困生

一直在陈学强家里进出的“小女儿”,竟不是他亲生的?不知情的邻居很难相信。事实上,老陈是在8年前毫无思想准备地接纳小丽的,当时,还是碍于领导的临时“摊派”。

老陈是重庆沙坪坝区市政环卫处一名驾驶员。2001年5月,该处组织员工对该区25名贫困生进行对口资助。当时,因上有老母瘫痪在床,下有一女在技校读书,高度近视的妻子下岗失业,全家人就靠老陈微薄的工资度日,因此,他没有加入资助行列。

此后一天,老陈送同事到对口的曾家中学办理资助手续。“当时,校长介绍说,上报学生名单时,有个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寒的女学生被漏报了。”

小丽就是校长介绍的那名

漏报学生,与她见面后,同行的工会主席指着老陈半开玩笑地说:“一起来的,就你还没结对子,要不,你来资助她?”

之前尽管没有资助打算,但领导这样说了,加之了解到小丽的父亲离家出走,母亲再婚,家里只有70多岁的爷爷以及高祖母后,老陈犹豫了一会,点点头,应承下来。

就这样,老陈每学年通过学校资助她100元。

资助承诺不断升级

听说丈夫被“摊派”了资助任务,周恩碧提出要去看看小丽。

“一见面,她的朴实、聪明就让我喜欢。”周恩碧主动提出认小丽当干女儿,并在带去的零食中,夹了一张50元纸币递给小丽。

当年暑假,小丽打来电话,说想来看看干爹干妈一家。

“和干爹一家接触后我才晓得,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很拮据。”小丽了解到干爹一家是穷帮穷后,暗自无数次掉下感激的热泪。

小丽到陈家时,周恩碧找了份替人洗衣服的零时工作,“月工资500元,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”在陈家“探亲”的一周时间,14岁的小丽主动洗衣做饭,更承担了给瘫痪在床的婆婆倒罐子、擦身子的“任务”。

此后的周末和寒暑假,小丽到干爹家走动越来越勤。周恩碧说:“渐渐地,我们都当她是回家来了。”进门就找事做,则成了小丽的习惯。

与小丽同批获得沙坪坝区市政环卫处员工资助的贫困生,双方的资助约定是至初中毕业为止。其他25名学生,如约终止了相互的资助关系。但小丽很幸运,因为老陈对她的助学承诺不断升级。

小丽中考前,周恩碧再次失业,老陈却表示延长助学协议,承诺小丽:“只要你考上高中,我就继续资助你。”

亲生女儿在读书,婆母卧病在床,丈夫仅有1000元左右工资,他拿什么资助小丽?周恩碧决定外出打工。但她鼻梁上那副1500多度的高度近视眼镜,成了拦路虎。

干爹戒烟干妈打工

老陈的单位知情后,被他们的举动感动,吸纳周恩碧到辖区看守厕所,给予补助。

小丽没让干爹干妈失望,考上了凤鸣山中学。当年,老陈一家也搬到离凤中不远的凤天路新家。

从此,老陈每学年资助她1000元住宿费,每周给50元生活费,还给买衣服等。

为节约开支,老陈希望小丽走读,但小丽认为住读更有学习氛围。

“既然有利于她学习,一年多支出1000多元住宿费也值。”周恩碧想得开,亲朋却为她的亲生女儿抱不平了:“自己的娃娃都待业了,你却打工去供别人的孩子,简直是胳膊肘往外拐。”

周恩碧却说,两个女儿自己是同等对待,“谁愿意读,能读,家里就支持谁。”

2006年,老陈所在单位食堂建成,考虑到他家实际情况,单位将周恩碧特招成零时工。

“当时,我已退休6年,每月有几百块钱的退休工资,解决自己的生活没问题。”但为了承担小丽的生活费、学杂费,周恩碧成了食堂的勤杂工。她每月680元的工资全用到小丽身上。那年,小丽考上重庆邮电大学,学费靠赞助单位支付,但食宿费却无着落。

老陈还是那句话:“你自己考上的,我会继续资助你!”此后,老陈也戒掉了几十年的烟,他们要尽力保障小丽每年近6000元的开支。

这个女儿感恩孝顺

小丽4年学业已完成3

年,面临毕业,与干爹一家相处的点滴,总是不断浮现在脑海。

“第一次到干爹家,干妈就专门买了鸡腿给我打牙祭。”小丽至今想起干妈给自己夹鸡腿的事,仍忍不住热泪盈眶。“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”

此后,周恩碧在商场为她买的一双80多元的皮鞋,则成了小丽生命中第一双最贵的鞋子。“之后,干爹干妈为我添置的衣物是三四百元一件,而他们至今还穿二三十元一件的衣服,有的一穿就是七八年。”

小丽说,自己上了高中,干爹为她配手机,每次回校,干妈总要为她捎上最爱吃的肉末豇豆;放学未按时到家,干爹干妈就会打电话追问……

老陈和妻子则夸奖小丽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。“她读大一时,我满49岁,这孩子竟用做家教挣的钱,给我买了件200多元的衬衫。”虽然嘴上责怪小丽浪费钱,但老陈心里像喝了蜜。至今,他都把那件衬衫珍藏在衣柜里。而周恩碧的生日,总会收到小丽带来的蛋糕。“礼物虽小,但让我们暖心!”

19日中午,记者在食堂见到周恩碧时,她正忙着传菜、端饭。热腾腾的蒸气蒙住眼镜镜片,她来不及擦拭;汗水让镜架直往下掉,她来不及扶正。因为动作稍慢,就会影响下道工序。

对于这样的辛苦,周恩碧说,等小丽大学毕业了,“我就真正歇业好好和老陈过下半辈子。”

当然,他们和小丽的关系也会继续,因为,小丽和干爹一家约定:对方将是自己一辈子的亲人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称“生活太累”高中生家中寻短见

张慈兰爬上七楼,敲了几下门,家里没有任何动静。掏出钥匙,打开门的一瞬间,她差点没有叫出声来:19岁的儿子朱斌悬在客厅的吊灯上,已没了呼吸。

“生活太累了……”这是朱斌告诉家人他选择自杀的原因。

儿子已去世多天,44岁的朱四海仍感觉自己生活在梦中。

8月19日中午,湖北云梦县云台路水果街。在水果街的正中,有一间水果门面,门前没有摆放任何水果。商铺的里间,店主朱四海坐在床沿上,妻子张慈兰睡在床上,夫妻俩都不说话。儿子死后,夫妇俩一直持续着这样的状态。

相隔仅几百米的白云小区7楼,是他们一年前买下的房子。8月15日,朱四海19岁的独子朱斌就吊死在客厅的吊灯上。

处理完儿子的后事,夫妇俩把生活用品从家里搬了出来,住到了租的门面房里。在亲人的劝说下,他烧掉了儿子生前的所有东西,除了一沓照片,“这是唯一的纪念,想他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。”

自杀

8月15日晚上9点左右,张慈兰在隔壁的水果店买了一点桃子和葡萄,又拿上自己店里剩下的几个苹果,准备带回家给儿子朱斌。

她已经两天没见到儿子了。朱斌今年刚刚升入高三,从7月9日开始,他就读的学校就开始补课。

往常这个时间,朱斌应该还在学校上晚自习。但走到家门口的时,张慈兰觉得有点奇怪,她在小区的院子里看到了儿子平常上学所骑的红色电动车。

她爬上七楼,敲了几下门,家里没有任何动静。掏出钥匙,打开门的一瞬间,她差点没有叫出声来:19岁的儿子朱斌悬在客厅的吊灯上,一动不动。

张慈兰大声哭喊着冲过去,放下儿子,他已没了呼吸。

8月19日下午,朱四海从枕边找出儿子生前的照片,整整有上百张,他一张张地翻看。

照片中的朱斌高大帅气,戴着近视眼镜,显得阳光、文气,但很少看到笑容。

其中一张,朱斌站在深圳的海边,双臂环抱胸前,眼睛望着前方,眼神沉静,背后是蔚蓝色的大海和海中嬉戏的人群。

“这一张照得最帅。”朱四海说。

日记

在事后的调查中,云梦当地警方在其家中找到了朱斌生前的日记本,在日记本的最后,他写下了遗书。

遗书用蓝色水笔写成,寥寥百余字,字迹潦草。“生活太累了……”朱斌在遗书中告诉了家人他选择自杀的原因。

这是一个蓝色封皮、仿线装的日记本,封面上印着一个大大的“兰”字。

日记本的最后几页被撕掉,看得出来,这份遗书朱斌写了多次。“可见当时他的心里

经历过复杂的斗争。”一位参与调查的人士分析。

遗书没有落款,只是在最后写下了大大的“绝笔”二字。

在遗书中,朱斌说自己感觉生活太累。他还提到,自己一生“险”了三次,“其中最危险的一次,幸有人救了我。”“也许那一次就不该被救活,这次谁也无法救我了。”

在遗书的前面还有他几年来的日记,他在记录上异常混乱,时间上没有逻辑性,每篇都只有几句话,字写得很大。除了时常会用到一些生僻的文言文,他还经常写错别字。

在一篇日记中朱斌提到,自己性格孤僻,感觉难以融入社会。紧接着一个“需”字后,突然顿笔。

朱四海夫妇俩始终想不通,儿子的生活压力究竟来自哪里。自从他俩开始做生意,家庭的经济状况已有所好转,并已在县城安家。儿子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上维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,“考个二本学校不成问题。”

张慈兰回忆,出事前几天,儿子曾向她提及过,想休息几天,不想补课了。“其他学生都在补课,我怕他落后,没有同意。”

补课期间,学校曾放过一个星期的假,朱斌独自一人乘车到武汉,在武汉大学整整玩了一天。当天回来之后,他就对家人说,一定要考上武汉大学。

他还想到苏州和杭州散心,但因为没买到火车票,最终放弃。

打架

正像他日记中所写的那样,在朱斌的同学眼中,他是个较为孤僻的人。

“他几乎没有什么很要好的朋友,从来都是独来独往。”他现在的同班同学李明说。

但在李明眼中,有时朱斌也会表现出他的另一面。在与熟人交流时,他偶尔也会讲出几个冷笑话,“不过大家都觉得不好笑。”

李明还说,朱斌的性格有较为明显的两面性,一般情况下,他不与其他人讲话,但另一方面,他脾气暴躁,稍有不对,有可能马上会爆发,声音很大样子很凶,“有时也让人感觉很害怕。”

有一件事情,熟悉他的同学印象都非常深刻。

有一次,朱斌和同学一起到食堂吃饭。他给同学占了一个座位。另一个同学到食堂后,想坐这个位置,朱斌一句话没说,直接拿起板凳砸向了对方的头部。

他还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。

有一次考试,老师站在他的后面看他做题,指出了他的错误,批评了他几句,朱斌即刻发火,与老师发生争吵。

云梦当地警方调查后称,朱斌此前有过精神方面的疾病,其家人还带他到武汉和孝感等地去看过心理医生。

对此,他的家人并不承认。

复读

朱斌今年19岁,与同班多数同学相比,他的年龄偏大,因为他读过两个初中。

据他的初中同学张鸿说,朱斌小学毕业后,父母为了让他能受到严格的教育,将他送到了云梦县伍洛镇的中学读书,这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,从此,他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

朱斌在日记中提到,父母将他送到伍洛中学读初中是个错误,让他彻底开始自暴自弃。

在张鸿的记忆里,朱斌在伍洛中学读了大约一年之后休学回家,其后大约两年时间内,都没有到学校上课,“他好像一直在外面混。”

两年之后,在父母的安排下,朱斌进入了云梦一中附属中学重新开始读初一。复读后的朱斌感觉就像变了一个人,“学习刻苦得让人害怕。”

那时候,他每天抱着书本,除了吃饭的时间,几乎都在看书。成绩总是稳定在班级十余名。

在他的初中老师看来,朱斌虽然刻苦,但是成绩总得不到很大的提高,“他不是个天资很好的学生。”

因为他年纪较大,而且,当时他的身高已到了一米七以上,是班上个头最高的学生。

班上选举班长,全班共60个同学,有50票投给了他。

张鸿清楚地记得,当选的当晚,老师不在,朱斌像个领导一样走上讲台,对全班同学“训话”,希望大家以后能配合他的工作。

“他那时好像与其他同学没什么不同。只是比一般同学都成熟,当其他同学还在追星时,他关心的已是国家大事和时事政治。”

熟悉他的同学认为,有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导致了他后来性格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在湖北人口密度最大的云梦县,每年大约有4000余名学生高中毕业,考上大学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

家长对记者说,高中不给施加压力,孩子的一辈子可能就完了。

生日

朱四海夫妇俩对孩子近年来的印象是模糊的,记忆更多停留在儿子小时候。

7月29日,农历六月初八,是朱斌19岁的生日。朱四海夫妇俩几乎忘记了这一日子。

一年前,朱家在云梦县城买房安家后,朱斌经常独自一人住在百余平米的新家里。

父亲朱四海承认,近年来与孩子的沟通很少,除了生活上,很少注意到儿子有什么很大的变化。“对学习上的事情,我们更是很少过问。”

事发之前,朱四海在陕西调运苹果,张慈兰在店里照看生意,已经有两天没有与孩子见面。

在一篇日记中,朱斌写道:“不该搬过来的。”此前,他一直和父母同住在这狭小的门面房里。

朱四海夫妇对孩子几乎有求必应。“他小时候跟着我们受了不少苦,现在要尽可能地满足他。”

现在,他们每个月给朱斌500元的生活费。因为要做生意,两人几乎没有时间给孩子做饭。尽管朱斌不住校,但他每天都在学校吃饭。

事发之后,警方调查时,发现朱斌还有两千多元的存款。

据云梦警方介绍,出事之前,朱斌曾给母亲打过电话,希望与母亲好好谈谈,但是,张慈兰没有发现儿子的反常。当天,他还曾邀请一个同学一起到校外吃饭,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,这位同学没有赴约。

(文中涉及朱斌的同学均为化名) 据《长江商报》